

文化传媒 法律资讯

Entertainment Law Update

2024 年 7 月

• 第五十四期 •



上海市律师协会
文化传媒专业委员会



东方律师
SHANGHAI BAR ASSOCIATION

主任：詹德强

副主任：(按姓氏拼音)

郝红颖

李伟华

邵 烨

干事长：马明宇

执行编辑：邵 烨

编委：(按姓氏拼音)

陈 敏 陈欣皓

韩 玉 侯 杰

祁 筠 邵 烨

王恢复 王敬文

徐倩倩 许 超

姚 利 叶 锦

俞丽莎 詹德强

张偲杰 赵晓波

郑弥弥 周 琦

本期责任编辑：

邵 烨

干事：(按姓氏拼音)

张和平

法规速递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	5
《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	13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效能的指导意见》	15
《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	20

文传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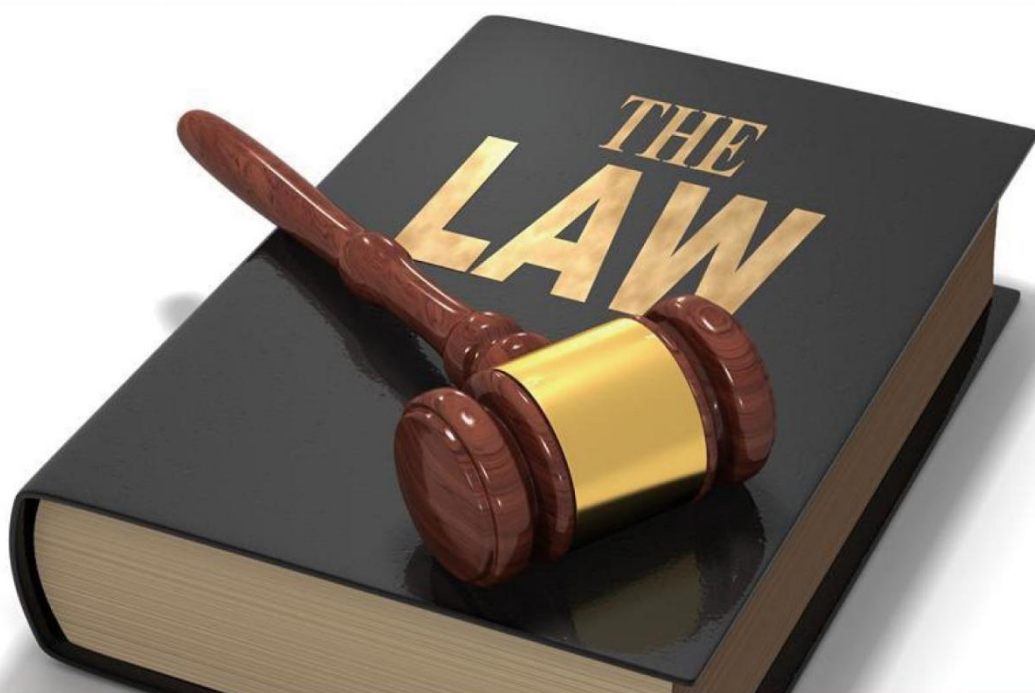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发布：赋能人类共同未来	27
促进双多边协商 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积极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国际合作	27
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2024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28
依法严惩“按键伤企”最高检发布典型案例	28
国家版权局发布2024年度第七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	29
2024（第二十三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京开幕	28
抖音关于虚假人设的治理公告	30

案例分析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32
-------------------------------------	----

委员会宗旨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积极发展文化事业的背景下，在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领域内，打造一支专业的律师队伍，搭建一个有效的联动平台，助力一批优秀的创新项目，献策一套先进的法律法规。通过在图书期刊、影视音像产品、广播电视、娱乐演出、文物艺术品及互联网等领域的理论研究、热点探讨、走访调研、献策献言，为上海乃至全国文化传媒行业的规范化、产业化、金融化、国际化助力。



法规速递

Law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制定程序，提高规章质量，根据《立法法》《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的决定、命令，在职责和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的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备案、解释、修改和废止等，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制定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应当坚持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遵循《立法法》确定的指导思想和立法原则，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第四条 制定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应当切实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规定其应当履行的义务的同时，应当规定其相应的权利和保障权利实现的途径。

制定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应当体现行政机关的职权与责任相统一的原则，在赋予有关行政机关必要的职权的同时，应当规定其行使职权的条件、程序和应承担的责任。

没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命令的依据，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部门的法定职责。

第五条 规章的名称一般称“规定”、“办法”、“规程”、“指南”，不得称“条例”。

第六条 规章用语应当准确、简洁；条文内容应当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

规章内容复杂的，可以分章、分节。必要时，可以有目录、注释、附录、索引等附加部分。

第二章 立项

第七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各部门单位认为需要制定、修改规章的，应当在每年 12 月 1 日前，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制度制定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

条法司报送立项申请。立项申请应当列明项目名称、立项必要性和可行性、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拟确立或者完善的主要制度、起草部门单位、前期准备情况、项目负责人、项目承办人、进度安排和完成时间等内容。

第八条 条法司对各部门单位提出的立项申请进行研究论证，拟订国家知识产权局年度立法工作计划。

制定立法工作计划应当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充分论证。立法项目根据问题导向、社会需要和实际条件可列为两类，第一类为紧迫性强、社会需求度高，条件较为成熟，在基本概念、职能划分、法律责任等方面不存在重大争议的；第二类为有立法需求，但立法条件相对不够成熟，需抓紧工作待条件成熟后尽快提请审议的。

第九条 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应当严格执行。起草部门单位应当抓紧推进起草工作，其中被列为第一类立法项目的，起草部门单位应当在3月1日前按照第十六条的要求提交规章送审稿及相关材料。

条法司应当及时跟踪了解立法项目进展，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起草部门单位认为规章涉及的法律关系复杂或者存在较大法律风险的，可以商请条法司提前参与。

未按照年度立法工作计划规定时限完成的立法项目，起草部门单位应当说明原因并报请局有关负责同志同意后，将有关情况书面通报条法司。

第十条 根据工作实际，确有必要增加立法项目的，由相关部门单位提出立项申请并说明理由，报请局主要负责同志同意后纳入当年立法工作任务。

第三章 起草

第十一条 列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的规章，由提出规章立项申请的部门单位负责起草工作。规章内容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部门单位的，由一个部门单位牵头起草，相关部门单位配合。综合性的规章可以由条法司组织起草或者组织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起草。起草部门单位应当向条法司通报起草工作进展情况。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制度制定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

起草专业性较强的规章，可以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局公职律师参与起草工作，或者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位、社会组织承担起草任务。

第十二条 起草规章，应当贯彻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精神，深入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综合运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和集体讨论等方式。听取意见可以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并将意见收集和采纳情况形成书面报告。

第十三条 在规章起草过程中应当充分征求局有关部门单位的意见，并主动协调一致；经充分协调，与局有关部门单位无法达成一致的，应当报请局有关负责同志决定。涉及国务院其他部门的职责或者与其关系紧密的，还应当充分征求国务院其他部门或者司法机关的意见。

涉及国务院其他部门职权范围，需要联合制定规章的，应报请局有关负责同志同意。起草部门单位应当与有关部门就相关条款充分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

第十四条 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规章草案及其说明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意见征求时间应当不少于三十日。依法需要听证的，起草部门单位应当举行听证会。

第十五条 起草部门单位根据征求意见的情况，对规章草案进行修改，形成规章送审稿，经起草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后，正式报送条法司审查，涉及其他部门单位的，应当会签有关部门单位。

第十六条 报送规章送审稿时，起草部门单位应当提交下列文件和材料：

（一）规章送审稿，主要包括制定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主管机关或者部门、适用原则、具体管理措施和程序、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法律责任、施行日期以及其他需要规定的内容；

（二）规章送审稿的说明，主要包括：制订规章的必要性、可行性、规定的主要措施、有关方面的意见及其协调处理情况，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上位法规定的情况，与有关规章的协调和衔接情况以及适应改革需要的情况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制度制定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

（三）对规章送审稿主要问题的不同意见；

（四）其他有关材料，包括依据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调研报告、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笔录和报告、国内外有关立法资料、修改稿的新旧条文对照表、意见采纳情况对照表、所规范领域的实际情况和相关数据等；

按照规定应当对送审稿进行公平竞争审查、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等评估论证、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自评估、科技创新一致性审查的，起草部门单位应当提供自评估材料。

第四章 审查

第十七条 规章送审稿由条法司审查，审查内容包括：

- （一）是否符合本规定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
- （二）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
- （三）是否符合规章制定的法定权限和程序；
- （四）是否与有关规章协调、衔接；
- （五）是否正确处理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对规章送审稿主要问题的意见；
- （六）是否符合立法技术要求；
- （七）需要审查的其他内容。

第十八条 规章送审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条法司可以予以缓办或者退回起草部门单位：

- （一）制定规章的基本条件尚不成熟或者发生重大变化的；
- （二）国务院有关部门、机构或者局有关部门单位对制定规章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重大问题或者对规章送审稿规定的主要制度存在较大争议，起草部门单位未进行充分协商力求达成一致的；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制定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

（三）规章的结构、内容或者立法技术上存在较大缺陷，需要作全面调整和修改的；

（四）未按照有关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的；

（五）未按照规定报送相关审查材料的；

（六）其他不宜提请局务会议审议的情况。

被退回的规章送审稿经起草部门单位修改，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于退回之日起四十五日内重新送条法司审查。未在规定时限内重新送审，或者送审稿及其说明仍不符合要求的，一般不再按照年度规章制定工作计划执行。

第十九条 在审查过程中，条法司应当开展下列工作：

（一）将规章送审稿或者规章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发送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征求意见；

（二）就规章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深入基层进行调研，听取基层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

（三）针对涉及重大利益调整的规章送审稿，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委托研究等多种形式进行论证咨询，广泛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

第二十条 规章送审稿涉及重大利益调整或者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有较大影响，人民群众普遍关注，起草部门单位在起草过程中未举行听证会的，条法司报局有关负责同志批准后，可以按照规定程序举行听证会。

第二十一条 条法司可以将规章送审稿或者修改稿及其说明等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期限一般不少于三十日。

第二十二条 条法司应当认真研究各方面意见，会同起草部门单位对规章送审稿进行修改，形成规章审议稿及其说明。说明应当包括制定规章拟解决的主要问题、确立的主要措施以及与有关部门单位的协调情况等。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制度制定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

规章审议稿及其说明经条法司司务会集体研究通过后，按程序提出提请局务会议审议的建议。

第五章 审议、公布和备案

第二十三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应当由局务会议决定。局务会议审议规章草案时，由条法司负责人作起草说明，特殊情况下也可以由起草部门单位作补充说明。

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并与国务院其他部门联合制定的规章，应当经局务会议决定，由局主要负责人签发后，送联合制定的其他部门签发。

由国务院其他部门主办并与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制定的规章，由条法司会同相关司局提出审查意见后，经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由局主要负责人以及联合制定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同署名公布，使用主办机关的命令序号。

第二十四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令应当包括规章的制定机关、序号、规章名称、通过日期、施行日期、局主要负责人署名和公布日期等内容。

对仅涉及部分内容修改的规章，可采取仅对修改部分予以发布的形式。

规章标准文本的公告应当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公报或者国务院公报上刊载，并应当在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中国知识产权报和国家知识产权局政府网站上刊载。

第二十五条 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但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规章施行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六条 自国家知识产权局令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条法司应当依照《立法法》和《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的规定向国务院备案。条法司应当于每年一月底前将上年度所发布的规章目录报国务院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备查。

第六章 解释、修改和废止

第二十七条 规章解释权属于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国家知识产权局解释：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制度制定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

（一）规章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规章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规章依据的。

规章解释参照规章送审稿审查程序，由规章起草部门单位提出解释草案，条法司提出审查意见，按程序提请局务会审议公布。

规章解释与规章具有同等效力。

第二十八条 规章有下列情况之一，应当予以修改：

（一）基于政策或实践的需要，有必要增减内容的；

（二）因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依据修改或者废止而应作相应修改的；

（三）规定的主管机关或者执行机关发生变更的；

（四）同一事项在两个以上规章中有规定并且规定不相一致的；

（五）个别条款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不一致，但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必要继续实施的；

（七）其他需要修改的情形。

规章修改的程序，参照本规定第二章至第五章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九条 规章有下列情况之一，应予废止：

（一）规定的事项已执行完毕，或者因情势变迁，无继续施行必要的；

（二）因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等依据废止或者修改，失去立法依据的；

（三）同一事项已被新规章规定，并发布施行的；

国家知识产权局规章制度制定程序规定（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内容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

（五）主要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政策相抵触的；

（六）其他需要废止的情形。

第三十条 规章的修改或者废止，应当经局务会议通过，由局主要负责同志签署国家知识产权局令予以发布。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组织起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草案的工作程序，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规章发布后，可以适时开展立法后评估，并把评估结果作为修改、废止有关规章的重要参考。

起草部门单位负责立法后评估工作的具体实施。必要时，条法司可以自行或者会同起草部门单位共同开展立法后评估工作。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我国公民、组织依法处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维护我国公民、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国务院负责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管理工作的部门（以下称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以及商务主管部门，加强对我国公民、组织处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指导和服务，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

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共同做好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相关工作。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结合本区域实际情况，加强对本区域内各类主体处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的指导和服务。

第四条 国务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分工完善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及时收集和发布国外有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信息，为公众提供国外知识产权信息查询服务。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完善外国法律法规数据库，将外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作为重要内容，及时收集和发布相关信息。

第五条 国务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分工对国外知识产权制度变化、重点信息加强跟踪了解，开展典型案例分析研究，及时发布风险提示或者预警信息，为公众提供涉外知识产权预警。

第六条 国务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商务主管部门依照职责分工健全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指导工作机制和工作规程，为我国公民、组织处理涉外知识产权纠纷提供应对策略指导和维权援助。

第七条 国家支持商事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参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解决，为我国公民、组织提供高效便捷的涉外知识产权纠纷解决途径，引导我国公民、组织通过和解、调解、仲裁等方式快速解决涉外知识产权纠纷。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加强对商事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开展涉外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仲裁的指导。

第八条 国家鼓励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服务机构等提高涉外知识产权服务能力，通过设立分支机

国务院关于涉外知识产权纠纷处理的规定（公开征求意见稿）

构、联合经营等方式在国外设立执业机构，为我国公民、组织提供优质高效的涉外知识产权和法律服务。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措施，为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加强涉外知识产权服务创造条件。

第九条 国家鼓励保险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开展涉外知识产权相关保险业务，支持企业设立涉外知识产权维权互助基金，降低维权成本。

第十条 国家鼓励商会、行业协会、跨境电商平台等组织搭建涉外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平台，开通服务热线，提供咨询、培训等公益服务。

第十一条 企业应当加强合规管理，建立健全内部规章制度，加强知识产权人才储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and 运用；进入国外市场，应当主动了解所在国家或者地区法律制度、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依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积极维护合法权益。

国务院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聚焦我国企业涉外经营活动中知识产权保护需求，围绕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面向企业开展宣传、培训，提升企业涉外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纠纷处理能力。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加强知识产权相关法治宣传，全面提升我国公民、组织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的能力。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24 年 月 日起施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效能的指导意见

国知发服字〔2024〕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知识产权局，各地方有关中心；国家知识产权局局机关各部门，专利局各部门，商标局，局其他直属单位、各社会团体：

为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普惠工程，促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更好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保障，充分发挥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统筹管理作用，进一步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效能，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决策部署，积极融入国家创新体系，聚焦服务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促进“一省一策”知识产权强省建设，以知识产权源头保护为基础，以转化运用为牵引，以服务知识产权工作全链条为抓手，持续推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主体提升服务能力、提高服务质量，在持续强化利企便民的普惠性服务基础上，更大力度加强对科技创新和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公共服务支撑。

（二）基本原则。

坚持服务大局。围绕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型工业化等战略布局，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优势，围绕服务链促进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助力各类创新主体提高创新能力，加快推动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

坚持聚焦重点。围绕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明确的重点领域提供公共服务，通过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助力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助力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支撑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效能的指导意见

坚持服务全链条。聚焦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高效益运用、高标准保护，积极拓展公共服务领域，丰富服务方式和服务内容，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强化数据支撑和信息化保障，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与保护体系、运用体系协同发力。

坚持普惠服务与重点服务并重。加强知识产权服务资源有效整合，根据不同类型创新主体创新能力和创新阶段的需求差异，以及不同服务机构服务的差异化优势，建立供需匹配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三）主要目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利企便民水平得到新提升，各级各类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布局更加合理，运行更加高效，社会公众和创新主体享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便利化和可及性显著提高。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支撑重大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市场活力，推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

二、强化攻关服务，为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提供动力

（四）强化对科技创新力量的公共服务支撑。引导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主动了解并持续跟踪科技创新主体对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的需求，将知识产权信息深度挖掘和分析利用贯穿于科技创新项目立项、技术研发、试验验证、推广应用等全技术周期，帮助研发团队优化研发路径、提升研发起点、实现高价值专利布局，有力支持科技攻关。

（五）强化对科技创新功能区的公共服务支撑。建立自主创新示范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等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制，强化知识产权数据资源供给，开发建设知识产权专题数据库，保障相关领域研发信息安全，充分利用专利导航、专利技术挖掘、知识产权分析等公共服务工具，强化对原创性引领性科技研发及基础研究的支撑。

（六）强化对产业知识产权强链增效的公共服务支撑。引导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围绕产业知识产权强链增效，开展知识产权战略咨询、产业发展分析、行业规划研究、知识产权风险预警等服务，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绿色低碳技术的知识产权推广应用，支撑发展壮大战略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效能的指导意见

性新兴产业，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应用，培育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支撑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加强自主知识产权创造和储备。

三、聚焦专利转化，协同推进知识产权高效益运用

（七）围绕盘活高校存量专利加强公共服务保障。引导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与高校科技成果管理及转移转化机构加强合作，开展高校专利盘点、筛选、对接、盘活、应用等工作，发现并培育具有运用前景的高价值知识产权和具有行业领先优势的高价值专利组合，通过提供展示平台及路演等方式，支持存量专利向重点产业加速转化。

（八）围绕中小企业专利产业化加强公共服务保障。引导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面向中小企业加大帮扶力度，指导中小企业开展知识产权布局，帮助中小企业优化研发方向和路径，促进中小企业以专利产业化为成长路径，实现内涵式创新发展；加强知识产权相关培训课程推广，通过各类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普及知识产权相关知识。

（九）推动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与市场化服务协同发展。加快推进知识产权服务业集聚区和知识产权服务出口基地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引导市场化知识产权服务机构树立以促进专利产业化为导向的服务理念，提供集成化专利转化运用解决方案，与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互促共进、协调发展；集聚公共服务与市场化服务力量，深入开展专利转化运用服务，加快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进知识产权高效益运用。

四、完善共治管理，支撑知识产权高标准保护

（十）围绕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为辖区内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快速维权中心、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分中心等机构开展公共服务提供所需支撑保障；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公共服务机构开展知识产权海外维权、侵权预警相关服务，助力企业“走出去”；支持公共服务机构选派专业人才作为知识产权纠纷行政裁决技术调查官，参与知识产权纠纷调处工作。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效能的指导意见

（十一）为高标准建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强化公共服务支撑。支持并指导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先行先试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创新举措，坚持普惠服务和重点服务相结合；加强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力度，支持示范区立足区域实际创新需求开展知识产权信息研究分析，加强对区域知识产权发展形势的研判，更好支撑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整体部署；挖掘示范区内公共服务机构支撑知识产权保护相关优秀案例，加强宣传推广；支持并指导示范区内公共服务机构开展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常态化普及推广工作，助力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平提升。

（十二）加强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数据支撑和信息化保障。加快建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信息平台，加强与地方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平台的互联互通，汇集各地知识产权行政裁决信息、执法信息、保护中心信息等数据资源，协同推进全国知识产权行政裁决、执法指导、信用监管等业务的全流程电子化，提升跨部门、跨区域、跨层级的知识产权协同保护能力。

五、加强分类指导，促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提质增效

（十三）进一步强化省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统筹管理。统筹做好辖区内各级各类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机构布局建设，形成职责清晰、优势互补、协同发力的工作格局，推广应用各级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和相关公共服务产品，培育推广专利密集型产品，推进产业创新发展；省级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骨干机构要发挥好承上启下的骨干节点作用，聚焦“一省一策”知识产权强省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信息研究分析，为制定知识产权强省建设推进实施方案、重大科技研究项目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支撑。

（十四）统筹推进知识产权公共服务重要网点开展针对性服务。加强对辖区内各类公共服务重要网点的指导和管理；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TISC）要瞄准国际一流水平，致力为企业深入挖掘知识产权信息价值、创新成果转化运用、海外维权等提供高质量信息服务；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要深度参与高校专利盘点和对接工作，帮助高校形成更多符合产业需要的高价值专利；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要在提供普惠性公共服务上持续发力，提升知识产权综合服务能力。

（十五）开展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信息采集。广泛开展公共服务信息采集工作，统筹指导辖区内地市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以及公共服务重要网点采集创新主体的问题需求，加强对采集信息的梳理研究，

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全面提升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效能的指导意见

及时采取相关服务措施，进一步强化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并定期通过公共服务网报送问题需求情况、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各类公共服务机构采取的针对性解决举措和取得成效。

（十六）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人才保障。统筹搭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人才网络，强化公共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持续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培训课程体系，充分利用优质培训资源，广泛、系统开展人才能力提升工作；持续加强知识产权职称工作宣传力度，鼓励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人才积极参加知识产权职称考试评审，畅通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人才培养、评价和成长的职业化通道。

各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进一步加强组织实施，结合本地实际推进各项任务落实见效，探索创新服务举措，积累务实管用的经验做法，加强宣传推广，积极争取地方政府更多保障。国家知识产权局将对省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分级分类指导公共服务机构围绕支撑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工作全链条开展的针对性服务和取得的成效、以及采集公共服务信息情况进行评价。

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做好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工作，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工作监督保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对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的政策措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前款所称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包括以下情形：

- （一）有关政策措施未履行公平竞争审查程序，或者履行公平竞争审查程序不规范；
- （二）有关政策措施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内容；
- （三）其他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情形。

第三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主管全国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工作，监督指导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工作，并对下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工作进行监督指导。

第四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应当遵循依法、公正、高效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处理对本级人民政府相关单位及下一级人民政府政策措施的举报。

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为有必要的，可以直接处理属于下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权限的公平竞争审查举报。

第六条 收到举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具备处理权限的，应当告知举报人直接向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

第七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

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

第八条 举报人应当对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举报内容一般包括：

- （一）举报人的基本情况；
- （二）政策措施的起草单位；
- （三）政策措施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具体情形和理由；
- （四）是否就同一事实已向其他机关举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举报人采取非书面方式举报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工作人员应当记录。

第九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收到举报材料后应当做好登记，准确记录举报材料反映的主要事项、举报人、签收日期等信息。

第十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收到举报后，应当及时对举报反映的政策措施是否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组织开展核查。

反映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移交有关单位处理。

反映尚未出台的政策措施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转送有关起草单位处理。

第十一条 举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处理，并将不予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

- （一）不属于本规则第二条规定情形的；
- （二）举报已核查处理结束，举报人以同一事实或者理由重复举报的；
- （三）对同一事实已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已经受理或者处理的；

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

（四）举报材料不完整、不明确，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未在七个工作日内补正或者补正后仍然无法判断举报材料指向的；

（五）不予受理举报的其他情形。

第十二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核查，可以要求起草单位、牵头起草单位或者制定机关提供以下材料：

（一）政策措施文本及起草说明；

（二）政策措施征求意见情况；

（三）公平竞争审查结论；

（四）关于政策措施是否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情况的说明；

（五）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

第十三条 经核查存在下列情形的，属于未履行或者不规范履行公平竞争审查程序：

（一）政策措施属于公平竞争审查范围，但未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的；

（二）有关单位主张已经开展公平竞争审查，但未提供佐证材料的；

（三）适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但未在审查结论中详细说明了；

（四）政策措施属于《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但未送交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公平竞争审查的；

（五）未按照《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听取有关方面意见的，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六）未作出公平竞争审查结论，或者结论不明确的；

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

（七）其他违反公平竞争审查程序的情形。

第十四条 经核查存在下列情形的，属于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

（一）政策措施中含有《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八条至第十一条规定的禁止性内容的；

（二）适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政策措施，经核查后发现不符合《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一）至（四）项规定的适用情形的；

（三）适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政策措施，经核查后发现存在其他对公平竞争影响更小的替代方案的；

（四）适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政策措施，没有确定合理的实施期限或者终止条件，或者在实施期限到期或者满足终止条件后未及时停止实施的；

（五）其他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的情形。

第十五条 核查过程中，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听取有关部门、经营者、行业协会商会对有关政策措施公平竞争影响的意见。

第十六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完备的举报材料之日起六十日内结束核查；举报事项情况复杂的，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六十日。

第十七条 经组织核查，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结束核查：

（一）有关政策措施不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的；

（二）在核查期间有关单位主动修改、废止有关政策措施的；

（三）有关政策措施已经失效或者废止的。

第十八条 经核查发现有关单位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制发《提醒敦促函》，督促有关单位整改。《提醒敦促函》主要包括收到举报和组织核查的有关情况、整

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

改要求和书面反馈整改情况的时间要求等内容。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提出以下整改要求：

（一）有关单位未履行或者履行公平竞争审查程序不规范的，要求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或者补正程序等；

（二）政策措施存在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标准内容的，要求按照相关程序予以修订或者废止；

（三）核查发现有关单位存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和机制不完善等情形的，要求健全完善有关制度机制。

《提醒敦促函》可以抄送有关单位的上级机关。

第十九条 有关单位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督促，逾期仍未提供核查材料或者整改的，上一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其负责人进行约谈。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根据工作实际，可以联合有关单位的上级机关共同开展约谈。

约谈应当指出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的有关问题，并提出明确整改要求。约谈情况可以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条 未依照《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开展公平竞争审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对有关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的建议。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工作中发现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涉嫌违纪违法的，可以将有关问题线索按规定移送相应纪检监察机关。

第二十一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经核查认为有关政策措施的制定依据涉嫌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的，应当逐级报告有处理权限的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由其按照本规则开展核查。

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

第二十二条 举报线索涉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及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等有关规定，移交有管辖权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调查处理。

第二十三条 对于实名举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可以根据举报人的书面请求，依法向其反馈举报处理情况。

第二十四条 鼓励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对违反《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的行为依法进行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第二十五条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做好本行政区域公平竞争审查举报信息的统计分析，有针对性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工作。

第二十六条 对公平竞争审查举报处理工作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关单位、个人应当依法予以保密。

第二十七条 本规则自2024年 月 日起实施。



文
传
热
点

Hot Topic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发布：赋能人类共同未来

来源：上海证券报

7月4日，2024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正式开幕。开幕式上，上海向全球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宣言提出要促进人工智能发展，维护人工智能安全，构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加强社会参与和提升公众素养，提升生活品质与社会福祉。期待全球各国政府、科技界、产业界等利益攸关方能够积极响应，共同推动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共同维护人工智能的安全，赋能人类共同的未来。

1. 促进人工智能发展

积极推进研发，释放人工智能在医疗、教育、交通、农业、工业、文化、生态等各领域的应用潜力。

建立合作平台，促进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推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公平分配，避免技术壁垒，共同提升全球人工智能的发展水平。

2. 维护人工智能安全

在人类决策与监管下，以人工智能技术防范人工智能风险，提高人工智能治理的技术能力。

推动制定和采纳具有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的伦理指南与规范，引导人工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防止其被误用、滥用或恶用。

3. 构建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倡导建立全球范围内的人工智能治理机制，支持联合国发挥主渠道作用，欢迎加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鼓励国际组织、企业、研究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等多元主体积极发挥与自身角色相匹配的作用，参与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实施。

促进双多边协商 参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积极推动数据跨境流动国际合作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期，中国在数据跨境流动方面的国际合作取得新进展：中国和德国签署《关于中德数据跨境流动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中国与新加坡数字政策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就数据跨境领域合作展开交流。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一环，数据跨境流动已经成为全球资金、信息、技术、人才、货物等资源要素交换、共享的基础。近年来，作为数据创造和消费大国，中国在该领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制定，为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繁荣注入新动能。

中央网信办启动“清朗·2024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来源：新华社

中央网信办7月13日通报，为切实加强未成年

人网络保护，营造更加健康安全网络环境，中央网信办近日专门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2024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

本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6个环节突出问题。

一是短视频、直播平台。“二次包装”经典动画或儿歌，集中展示暴力血腥内容。摆拍校园霸凌视频，将校园霸凌行为娱乐化。利用“网红儿童”牟利，恶搞儿童博取关注、卖惨引流。采取剧情电台、语音旁白等方式，诱导胁迫未成年人变相参与直播等问题。

二是社交平台。在未成年人照片分享、交友信息等页面，发布诱导不良交友、引流非法网站等信息。对未成年人实施“网络厕所”“人肉开盒”等行为。恶意编造网络黑话、低俗流行语，向未成年人传播不良价值观。创建专门话题、群组等，恶意发布反击攻略、进行恶意P图，煽动亲子、师生对立等问题。

三是电商平台。向未成年人售卖软色情手办文具、动漫周边等商品。利用儿童模特摆出不雅姿势、做性暗示动作，借未成年人形象进行无底线营销。提供有偿代骂，制作恶搞同学、学校的图文视频等服务。以售卖动漫剧作、电子游戏等为名，引流未成年人至第三方平台，违规提供涉黄涉暴资源等问题。

四是应用商店。利用相似标志和名称信息，假冒未成年人喜爱的APP，传播违法不良信息。通

过内嵌非法软件或违规马甲包等方式，恶意“变身”为涉黄涉赌平台。学习类、工具类APP偏离主责主业，传播打擦边球违规信息。具有匿名、加密等属性的小众APP，存在网络诈骗、隔空猥亵等问题。

五是儿童智能设备。设备自带APP包含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对第三方APP提供的信息内容审核把关不严，存在不良导向内容。提供相貌PK、运势测算等不适宜未成年人的应用或功能。以积分排行、功能解锁、背景更新等为名，诱导未成年人过度消费。

六是未成年人模式。提供“虚假模式”，用户进入未成年人模式后无内容、无法使用。模式下存在诱导未成年人模仿不安全行为、养成不良嗜好等内容。模式防逃逸措施不完备，无需验证即可退出。模式下存在诱导未成年人投票打榜、刷量控评等功能。

依法严惩“按键伤企” 最高检发布典型案例

来源：中国互联网协会

最高人民检察院7月28日发布检察机关依法惩治利用网络暴力侵犯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案例。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制造、传播涉企谣言，对企业实施敲诈勒索、损害商业信誉等犯罪，以网暴企业牟取非法利益，严重侵害企业合法权益。

据介绍，最高检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共5件。案例从依法严惩网暴伤企犯罪、全链条打击“网

络水军”等关联黑产、全力追赃挽损、促进企业依法经营、助推网络空间治理等方面，展现检察机关维护企业网络空间合法权益的做法与成效。

例如，在黄某某、吕某某敲诈勒索案中，检察机关综合考虑被告人犯罪金额、主观恶性、社会影响等，建议以敲诈勒索罪判处被告人黄某某有期徒刑十年，被法院采纳。在李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中，检察机关通过释法说理，促使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并按照检察机关认定的犯罪数额全额退还给被害单位，挽回了企业损失。在刘某某寻衅滋事案中，检察机关通过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夯实案件证据，对刘某某网络造谣、网暴伤企等的行为依法予以惩处。

最高检经济犯罪检察厅负责人表示，发布该批典型案例，一方面是彰显检察机关依法严惩网暴“按键伤企”犯罪的态度与坚定决心，向社会持续释放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的强烈信号，纵深推进“检察护企”专项行动，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也是揭露利用网络暴力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的犯罪手段，引导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同时引导广大网民增强法治意识，依法上网用网，共建清朗网络空间。

国家版权局发布 2024 年度第七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

来源：国家版权局

按照国家版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互联网传播作品版权监管工作的意见》及版权重点监管工作计划，根据相关权利人上报的作品授权情况，现公布 2024 年度第七批重点作品版权保护预警名单。

相关网络服务商应对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内的重点作品采取以下保护措施：直接提供内容的网络服务商未经许可不得提供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内的作品；提供存储空间的网络服务商应禁止用户上传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内的作品；相关网络服务商应加快处理版权保护预警名单内作品权利人关于删除侵权内容或断开侵权链接的通知。

各地版权行政执法监管部门应当对本地区主要网络服务商发出版权预警提示，加大版权监测监管力度。对于未经授权通过信息网络非法传播版权保护预警重点作品的，应当依法从严从快予以查处。。

2024（第二十三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京开幕

来源：重庆晨报

7月9日，由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的2024（第二十三届）中国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大会以“互联三十载 智汇新质变”为主题，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赵志国、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许心超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原邮电部部长、原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原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会长李毅中，第十四

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苗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互联网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邬贺铨，中国通信学会名誉理事长、国际电信联盟前秘书长赵厚麟，中国电子学会理事会党委书记，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张峰，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科技委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工业和信息化部原总工程师韩夏，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院长余晓晖等多位重要嘉宾出席开幕式。中国互联网协会理事长尚冰致欢迎辞。

抖音关于虚假人设的治理公告

来源：抖音安全中心

抖音一直致力于维护风清气正和安全可信的社区环境。近期平台发现，有少数“自媒体”策划虚假人设，在个人简介和发布内容中，自称为名企高管、专家或者自封不可查证的“大师”，以夸张或虚假的身份，博取用户信任，进而将用户引流至第三方平台变现。

上述行为，严重违反了平台规则，可能导致其他用户遭受经济、情感损失。请相关账号自查自纠，及时修改、删除不当个人简介和内容，或者根据平台认证要求，提交可信材料进行认证。平台将于即日起开展专项治理，对发现的违规账号，将采取包含重置昵称/个人简介、下架视频、取消营利权限、搜索不收录、禁止关注、封禁账号在内的措施进行治理。



案例分析

Case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作者：广州互联网法院课题组

广州互联网法院

来源：《数字法治》2024年第2期

链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8342399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短视频产业发展迅猛，短视频内容创作呈现爆炸式增长，在给社会经济带来诸多裨益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其中之一便是短视频侵犯长视频著作权现象频发。2021年4月9日，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等涵盖行业协会、视频平台、影视公司在内的73家机构发布联合声明，呼吁广大短视频平台和公众账号运营者尊重原创、保护版权，未经授权不得对相关影视作品实施剪辑、切条、搬运、传播等侵权行为。[1]按照法律规定，短视频平台应承担知识产权治理的义务，但实践中，对于用户上传的侵权内容短视频平台应如何承担责任，现有规范未能提供明确的解决依据。本文拟采用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厘清短视频平台承担侵权责任之边界，通过提炼司法裁判规则合理分配责任，平衡好著作权人、网络用户与短视频平台之间的利益关系，推动长、短视频平台共同健康有序发展。

二、短视频平台基础概况及行业背景

作为互联网领域的新兴产物，短视频平台有着许多区别于传统网络服务提供者的鲜明特征，导致其在与长视频平台的著作权之争中，难以直接适用传统的侵权责任认定方法。认识短视频平台对自身的角色定位，了解短视频平台的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及技术基础，有助于探究长、短视频平台纠纷中的矛盾所在，为短视频平台的法律责任界定提供方向和指引。

（一）方兴未艾：短视频平台定义及产业发展现状

1. 短视频定义及其用户规模

根据艾瑞咨询发布的《中国短视频行业发展研究报告》，短视频是指视频长度以秒计数，主要依托于移动智能终端实现快速拍摄和美化编辑，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实时分享和无缝对接的一种新型视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频形式。[2]与传统的长视频传播方式相比，短视频内容更加生动丰富，用户的实时参与和互动也更自然，适合互联网碎片化的传播趋势。

2023年8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络视频用户规模达10.44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1380万人，占网民整体的96.8%。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10.26亿人，较2022年12月增长1454万人，占网民整体的95.2%。与此同时，在用户规模和网民使用率排名居前的互联网应用中，短视频排名第三，并保持1.4%的年增长率。[3]

2. 短视频平台定义及其行业趋势

在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以及5G技术的发展推动下，互联网巨头纷纷打造短视频平台，为短视频营销提供了广阔的营销环境。2016年，抖音出现，其利用算法向用户精准推荐优质视频内容，推动短视频市场广告变现规模的迅速增长。2018年，抖音和快手两大头部平台持续发展，市场规模爆发式增长。随后，短视频市场格局逐渐稳定，用户覆盖率不断提高，增速开始减缓，市场规模仍持续上升，短视频平台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面对庞大的短视频市场，多数平台采取了差异化传播策略，深耕垂直领域，以最大限度地扩大用户规模。而鉴于各大平台所提供的服务内容及服务方式各有不同，其各自通过《用户协议》对自身平台进行界定，大部分平台将自身界定为信息存储服务提供商，即为用户提供视频发布、浏览、互动交流、搜索查询等功能的信息储存空间。

（二）比物连类：短视频平台传播内容及类型归纳

相对于长视频的内容呈现方式，短视频不拘泥于固定形式，创作者能够在作品中加入个性化表达，使短视频内容多样化的特征日趋明显。从著作权保护的角度，当前短视频平台中主要传播的视频类型可分为以下三类：（1）原创类短视频，即由创作者根据创意策划、脚本、音乐、演员等拍摄制作，独创性较强，一般采用自己制作的镜头素材，其所涉及著作权纠纷主要源于视频背景音乐的侵权问题。

（2）二次创作类短视频，即由用户利用已有作品的视频素材进行剪切、加工创作，引用素材主要集中在影视、综艺、动漫、体育及游戏等领域。根据短视频的内容形式，二次创作类短视频可进一步细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分。（3）搬运类短视频，即直接将影视、综艺、动漫等作品原封不动地搬运至短视频平台，除了按照短视频时长要求分段截取以外，不加任何剪辑，也不加入任何原创元素。其是否构成侵权较容易判断。（见表1）在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中，涉及的短视频类型主要集中于二次创作类中的剪辑类、解说类视频，长视频平台多因其内容会对原片形成替代作用，导致长视频平台用户流失、影响预期收益，以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及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诉讼。

表 1 短视频分类

分类		主要内容
原创类		根据创意策划、脚本、音乐、演员等拍摄制作美食、搞笑、剧情等内容
二次创作类	盘点类	围绕特定主题，对角色、场景、榜单等进行盘点
	剪辑类	直接将热门电影、电视剧、演唱会等内容进行剪辑
	解说类	对热门影视剧中的某个片段或整片的解说
	混剪类	围绕特定主题，将一个或多个作品的内容，通过混合剪辑或拼接组合在一起
	Reaction类	以自己或他人观看视频的反应作为录制素材，剪辑而成
搬运类		搬运类

（三）精准高效：短视频平台传播方式及主要特点

随着技术的优化与业态的完善，短视频平台发展日臻成熟，在传播作品的方式、功能、效果等方面均形成了显著的特点，具备传统媒介所无法比拟的优势。

1. 传播媒介平台化

短视频的生产和发布高度依托网络平台介质，平台自身的数据流量、用户基数、经营模式及影响力等因素，直接关系到视频的传播范围及传播速度。各短视频平台通过优化平台服务、强化流量推广等方式，形成了不同的竞争优势。

2. 传播路径精准化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在短视频领域的深度应用，各大短视频平台均形成了一套以算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法推荐为主导的内容分发与传播机制，使作品得以快速、精准抵达目标用户。相比于传统的传播方式，其具有传播覆盖面广、精准度高的优势，能够满足大众的个性化需求，提升用户体验，增强用户黏性。

3. 传播服务功能化

除了算法推荐以外，短视频平台基于用户上传作品及使用需求，将其提供的传播服务的推广作用功能化，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功能，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四类：榜单推荐功能、话题功能、合集功能及多种流量扶持激励机制。

4. 传播效果叠加化

短视频画面、声音、文字的相互结合能给用户带来更加真实、直观、全面的观感体验及更具冲击力的效果，也更能引发用户情感上的共鸣，从而产生较大的话题性和社会反响。此外，短视频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的特点，使其传播形成了信息重复、受众传播、信息再重复的循环状态。

（四）算法推荐：短视频平台技术核心及底层逻辑

短视频平台在实现内容分发的过程中，使用的技术核心是智能算法推荐。此推荐机制大致分为三类：协同过滤、精准推荐及叠加推荐。三类机制在实际平台算法运行中综合使用，可以是推荐结果的融合，也可以是用一个模型将集中类型的特征信息同时作为系统输入进行运算。

1. 基于用户基本信息的协同过滤

即通过用户注册账号时登记的个人信息进行人群划分并推荐内容。此种算法机制是最基础、最简单的推荐方法，主要考虑用户之间的相似度，通常在用户使用短视频平台的初期发挥最大作用，有效提高新用户的留存率。同时，地域定位是此类算法的重要依据。

2. 基于用户社交关系的精准推荐

具体可细分为两类：一是基于用户社交关系的圈层化推荐，即基于用户关注好友、通讯录好友以及好友的好友为主要对象构建的社交网络关系图谱；二是基于用户显性或隐性表达偏好的相似性推荐[4]，即以用户间共同的兴趣、专业等构建的社交网络关系图谱。目前，用户偏好是短视频推荐算法中最显著也是最核心的价值观要素，此种推荐机制大大提升了用户黏性，但此种“懒人式”的交互也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更容易创造出“信息茧房”，且算法推荐机制会更多地推荐流量池中相对头部的内容，加强了短视频内容的中心化（见图 1）。



图 1 基于用户社交关系的精准推荐流程

3. 基于内容流量池的叠加推荐

叠加推荐的评估标准是通过内容点赞量、完播率、转发评论量等综合权重进行评估，只要达到相应的量级，平台就通过人工运营和数据算法机制持续推荐。[5]短视频内容在初步分发时具有“去中心化”的特点，当用户创作上传一条新的短视频内容，平台会为其分配至基础流量池，如果在基础流量池中表现较好，该视频将会获得更多的推荐流量，在更大的流量池中进一步考察其反响，不断推进（见图 2）。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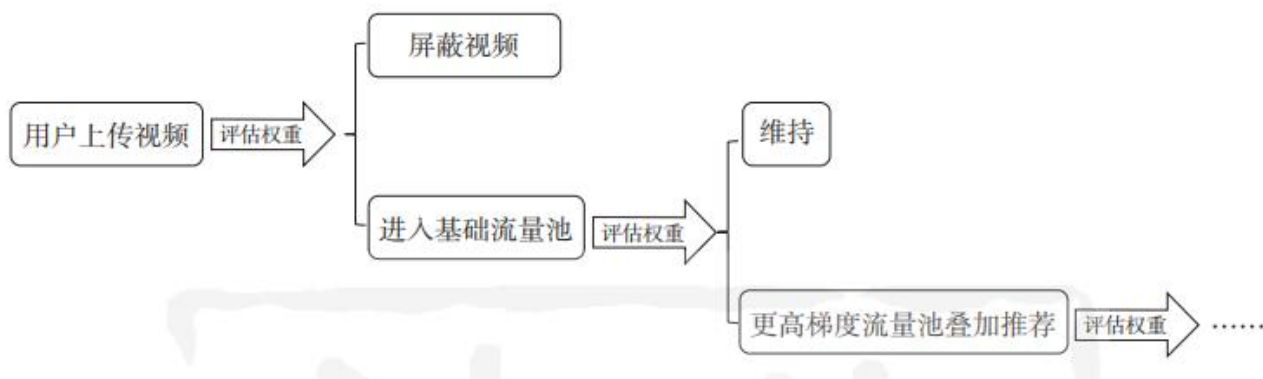


图2 基于内容流量池的叠加推荐流程

三、短视频平台著作权责任确定的实证考察

为了全面考察短视频领域的著作权侵权问题，课题组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等公开途径对短视频侵权相关的司法现状进行了检索与梳理，并设计调查问卷分别向长、短视频平台发放，通过实证分析总结出短视频平台著作权责任确定的司法裁判思路及争议焦点，为课题的理论框架提供现实基础。

（一）短视频平台著作权纠纷案件宏观分析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短视频”作全文检索词汇，并以“著作权”为关键字，可检索裁判文书共1840份。其中，行政案由3份、刑事案由2份，涉案短视频均系作为证据事实，而与侵犯著作权无关。由此可见，我国实践中治理短视频侵权问题的主要方式还是民事诉讼。总体来说，案件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 案件总量暂不显高

在1835件民事案由中，裁判最为集中的年份分别为2020年（452件）、2021年（397件）、2022年（474件）。可见，短视频著作权相关案件波峰在2022年。相对于我国每年侵犯著作权、特别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案件总量，以及近年来社会各界对短视频著作权问题的高度关注，上述案件总量并不显高。其主要原因在于短视频的市场生命力较短，只在短期流行，大多数商业价值有限。因此，当短视频自身的著作权受到侵害时，考虑到诉讼成本与救济的失衡，著作权人通常不会提起诉讼，尤其是个体作者。已经发生的诉讼也多半发生在网络平台之间。[6]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2. 案件地域分布较为集中

从地域分布上看，北京市（816 件）、广东省（355 件）、上海市（149 件）、浙江省（114 件）、山东省（109 件）占据裁判总数前五位，且占据全国短视频平台著作权相关司法裁判案件绝大比例。其中，北京市 816 件案件中，有 408 件由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有 214 件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结；广东省 355 件案件中，有 125 件由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

3. 案件类型相对趋同

以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案件为例，目前正在审理的短视频著作权侵权案件中，权利人主要以平台而非直接侵权用户作为起诉对象，即表现形式大多为长视频平台起诉短视频平台。而从所涉平台来看，涉侵权短视频所在平台包括抖音、西瓜视频、今日头条、快手等，其中以抖音平台为主，占据绝大部分。而权利人主张的权属视频类型主要集中在影视剧、综艺节目等，其中以电视剧为主。

4. 案件争议焦点相对集中

以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理的案件为例，目前正在审理的短视频著作权侵权案件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1）短视频平台的合集与话题功能设置以及智能算法推荐涉侵权视频的行为构成直接侵权抑或间接侵权，算法推荐技术是否中立；（2）短视频平台是否有能力采取过滤措施；（3）短视频平台是否应当承担过滤义务。

（二）短视频平台著作权纠纷典型案例分析

在“北大法宝”以“短视频”为关键词，以“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为案由检索，可得典型案例共计 31 件。围绕短视频平台著作权责任边界问题，可归纳出以下裁判共识。

1. 认可短视频的作品保护地位

在“抖音诉百度案”[7]中，北京互联网法院裁判认定，短视频是否具备独创性与视频长短无必然联系，短视频的编排、选择及呈现给观众的效果体现了制作者的个性化表达。在“短视频模板侵权案”[8]中，杭州互联网法院经审理认为，短视频模板本质上属于短视频，在判断短视频模板是否具有独创性时，不宜采取过高的判断标准。涉案短视频模板具备《著作权法》的独创性要求，属于视听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作品[9]。

2. 普遍对合理使用抗辩不予支持

在“配音秀素材侵权案”[10]中，法院认为，网络用户上传被控侵权视频的行为已非“为个人”，而是“向公众”，其上传行为已落入原告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的范围，不构成合理使用。在“A公司与B公司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摄制权纠纷上诉案”[11]中，法院指出，被告拍摄上传的视频中涉及“奥特曼”形象的有437段，共涉及33个奥特曼形象，已经对原告的合法权益造成实质损害，不符合著作权法合理使用的规定，构成侵权。

3. 短视频平台可构成直接侵权

在“王者荣耀短视频侵权案”[12]中，二审法院指出，“网络平台公司可能既构成直接侵权，又构成间接侵权，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此时平台公司的身份与法律地位”[13]。在“T音乐公司、T娱乐公司诉W公司案”中，法院认为，由于W公司不能证明侵权制品系网络用户上传，对案涉作品传播提供的技术服务不满足免责情形，应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4. 平台“知道”“应当知道”用户侵权行为的判断

在“配音秀素材侵权案”中，法院就明知与应知作说明指出：“明知”和“应知”在判断标准上存在区别，“明知”系指被告明确知晓用户上传内容为侵权内容，实践中明知证据通常系权利人发出的侵权通知；“应知”则是指虽无证据证明被告确切知晓用户上传内容构成侵权，但依据其所具有的认知能力及所负有的注意义务，其应当意识到用户上传内容构成侵权。而在“A公司与B公司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考虑到短视频平台存在在曲库中提供涉案歌曲的直接侵权行为，再结合短视频的音乐使用模式，短视频平台应当能够合理地认识到网络用户会使用其上传的涉案歌曲录制并上传短视频，且这些短视频又可被其他用户点赞、使用、下载等进而扩大涉案歌曲的传播范围，应当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却未采取必要措施加以预防，主观上具有过错。

5. 要求平台承担更高的审核义务[14]

在“音著协诉斗鱼案”[15]中，北京互联网法院明确指出，斗鱼公司既是直播平台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直播平台上音视频作品的权利人和受益者，对其平台上的侵害著作权行为不能仅限于承担“通知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一删除”义务，而应当对直播及视频内容的合法性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在“王某诉成都伦索科技有限公司案”中，法院认为，“被告从网络用户销售的视频中直接获取经济利益，对其网上存在的用户侵害著作权行为不能仅限于承担“通知—删除”义务，而应对用户提供的视频负有较高的审核义务。在被称为全国首例算法推荐案的“爱奇艺诉字节跳动案”[16]中，法院认为，关于平台是否采取了合理措施应考虑两方面要件：一是形式要件，即是否采取合理的手段与方式；二是实质要件，即后果要求实现应有的效果与目的，对效果的认定不能仅以是否删除及删除期间作为判断标准。

（三）短视频平台著作权纠纷社会调查分析

针对短视频平台争议问题，课题组先后向抖音、快手、西瓜视频、腾讯、优酷、Bilibili 等平台发放并收回有效问卷 7 份，旨在分别从长、短视频平台的角度，了解平台技术原理、产业模式、程序规则、纠纷处理及制度完善建议等。通过分析可见，长、短视频平台就部分问题所持观点存在较大分歧（见表 2）。

表 2 长、短视频平台企业问卷调查比较分析

		短视频平台	长视频平台
是否采取个性化推荐技术		均有，但未详细披露	
是否采取版权侵权预防措施		事前预防、事中监测和事后治理	
短视频版权侵权治理难点	技术	当前技术难以实现侵权视频事前过滤拦截	当前技术完全可以实现侵权视频事前过滤拦截
	法律	权属确认难、合理使用判断难	不存在合理使用判断难题
短视频对长视频的影响		既存在正面影响，也存在负面影响	
“通知—删除”实施情况	实施效果	已较好地履行“通知—删除”义务	目前“通知—删除”程序实施效果不佳
	实施困难	技术成本高，权利人投诉不规范、不配合	短视频平台“通知”环节设置过多障碍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当前短视频平台责任承担	责任过重	责任偏轻
应否提供侵权用户信息	不能向权利人直接披露平台用户信息	应向权利人直接披露平台用户信息
制度完善建议	维持当前“避风港原则”和“通知—删除”规则	提高短视频平台注意义务，短视频平台提供过滤措施

1. 关于技术原理与产业模式
- 各平台均确认其采用个性化算法推荐技术，但并未详细透露，仅一家企业对所采取的算法推荐技术原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披露，即基于内容的推荐方法、基于协同过滤的推荐方法和基于混合模型的推荐方法。
2. 关于著作权侵权预防措施
- 多数短视频平台表示已采用了较为完善的著作权侵权预防措施。这些措施通常包括事前预防、事中监测和事后治理三个层面。事前预防的主要措施包括加强审核队伍建设、履行提示义务等。事中监测的主要措施是针对热播影视剧、高危单片的主动治理，提升技术手段、优化策略、畅通举报渠道。事后治理的主要措施指积极履行“通知—删除”义务，设置丰富、全面的投诉渠道，对重复侵权账户的处罚机制等。此外，针对知名度较高的热播影视作品，部分短视频平台采取了专门措施进行重点治理，但也有平台表示无法采取特别措施，只能对相关关键词加强人工审核。
3. 关于短视频侵权治理困难
- （1）在技术上，短视频平台普遍认为，通过过滤技术对侵权作品进行事先过滤，存在较大困难：采用关键词过滤及哈希值过滤各有弊端；长视频平台不愿提供片源，缺乏可供比对的版权介质。而长视频平台否认存在上述技术困难，认为当前技术完全可以做到事先拦截。（2）在法律适用上，短视频平台普遍认为，短视频侵权治理存在确认权属及合理使用判断两大难题。前者指直播、短视频权利主体平民化、分散化，且缺乏有效的权利公示系统；后者则指短视频对长视频的使用可能构成合理使用，而合理使用是著作权法中较难把握、主观性较强的问题。长视频平台则普遍否认存在合理使用判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断难题，认为短视频中对长视频的使用基本都构成侵权行为。

4. 关于“通知—删除”程序实施情况

短视频平台普遍表示自己已较好地履行了“通知—删除”义务，提供了较为高效的“通知—删除”程序。长视频平台普遍表示目前“通知—删除”程序实施效果不佳：一是删除效率过低；二是无法解决重复侵权问题，使“通知—删除”规则陷入“通知—删除—再通知—再删除”的无效循环。

5. 关于法律责任承担

短视频平台普遍认为，目前法律对短视频平台施加的责任过重，存在加重短视频平台注意义务的趋势。长视频平台则持相反观点，认为短视频平台目前所承担的法律赔偿责任与其传播能力和盈利能力不相匹配，惩罚性赔偿的判决金额无法弥补权利人为维权而付出的巨大成本。就制度完善建议而言，短视频平台普遍认为，目前的“避风港原则”和“通知—删除”规则已足够解决相关问题。长视频平台则建议，在法律上提高短视频平台的注意义务，要求短视频平台提供过滤措施。

四、短视频平台著作权责任判断的争点分析

短视频平台上多发的侵权行为、短视频平台角色的转变，以及短视频平台与长视频平台著作权人之间的利益失衡，引发产业界和学界对于短视频平台责任的关注和热议，司法者也在裁判文书中通过个案进行探索。但关于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责任问题尚无统一的判定标准，长、短视频权益之争仍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也为案件审理带来了诸多挑战。

（一）“积极”或“消极”：短视频对长视频的影响评价不一

1. 社会评价不一

《消费者短视频版权调研报告》显示，83.3%的消费者认为不应对短视频进行“一刀切”式的全部禁止，72%的消费者认为短视频“二次创作”可帮助观众节省时间和金钱成本；22.2%的消费者反对版权滥用，平台方接到侵权通知后删除即应无责；仅5.6%的消费者坚决支持长视频或其他版权方起诉索赔。[17]可见，当前消费者及社会公众对于短视频对长视频的影响评价并不一致，甚至更多倾向于认为短视频对于长视频的宣传、推广起到积极作用。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2. 学界评价不一

部分学者强调短视频对长视频权利人的消极影响，认为不同的侵权人对影视作品分而食之，过滥的片段传播会引起观众的厌倦感，导致观众丧失对完整影视作品的欣赏欲望，整体上对影视作品的著作权损害极大。[18]与此相对，部分学者则认为短视频对长视频权利人具有积极影响，提出全民短视频的参与者具有“业余者”的属性与行为特征，丰富了著作权法生态环境，并不影响著作权法通过规制竞争者对作品的营利性使用行为来实现权利人的财产性利益，原创作者甚至可从第三方作品中获得“溢出效益”。如果对于未经许可使用的作品行为一概认定为侵权，必然会不当地阻碍我国商业模式的发展与创新。[19]

3. 法律评价不一

以“游戏短视频侵权案”为例，二审法院认为，基于平衡作品创作者、传播者、使用者各方利益的原则，尤其从促进游戏及其衍生产业发展的角度，应考虑游戏传播渠道对游戏的推广、发行具有积极、正向的促进作用，认为原审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没有考虑该因素略有不足。[20]

（二）“直接”或“间接”：短视频平台的侵权责任认定存争议

关于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司法认定逻辑及审查路径存在较大差异（见表3）。直接侵权，指行为人直接对他人实施侵害著作权的行为，在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和依法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将其短视频复制、转发传播。[21]司法裁判中普遍采用无过错原则，即不管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只要侵权人实施了上述行为，即构成侵权[22]。间接侵权，指行为人并未对他人直接实施侵权行为，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引诱他人实施直接侵权行为[23]。司法裁判中主要采用过错原则，若短视频平台无主观过错，且仅提供网络信息存储服务，则不构成侵权；若平台处于“明知或应知”状态，则构成间接侵权。

表 3 短视频平台直接侵权责任与间接侵权责任的区别

	直接侵权责任	间接侵权责任
行为外观	1. 平台设立自媒体，以平台的名义自行发布涉案作品 2. 平台要求员工发布涉案视频	平台明示提供的是“信息存储空间”，且涉案作品由平台用户（机构或个人）提供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3. 平台与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合作发布涉案作品	
平台作用	支配	帮助、引诱
归责原则	无过错	过错

当前，短视频平台的侵权类型主要包括：直接搬运、与第三方机构或个人合作、伪装自媒体、利用各种手段帮助或引诱用户上传短视频。[24]在直接侵权的判定中，前两种情况行为事实明显，因此较少存在异议。而第三种情况（伪装自媒体）行为事实相对隐蔽，且因素复杂，因此成为主要争议焦点。在间接侵权的判定中，受“责任过错标准”和“责任豁免条件”的复杂因素影响，短视频平台常常主张“技术中立”，以期利用“避风港原则”规避法律责任。此外，间接侵权责任的“过错”标准以及责任豁免等因素更为复杂，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

（三）“技术中立”或“算法黑箱”：短视频平台主动审查的责任边界不明

短视频平台是否承担主动审查的责任，关键在于是否具有“中立性”。若短视频平台仅是“网络服务提供者”，则对用户上传的作品不负有主动审查的义务，仅需承担一定条件下的间接侵权责任。对此，实务中同样存在不同观点。

1. 以技术中立认为平台不应承担过重的审查责任

技术中立是指技术本身无善恶之分。一个产品或技术被用于合法用途或非法用途，并不是产品或技术提供者所能预料和控制的，不能仅因为产品或技术成为侵权工具，而使提供者对他人的侵权行为负责。基于此，部分观点认为，短视频平台仅是为用户提供视频上传、观看、转发等服务，其基于算法向不同用户推荐相关视频的行为，属于纯粹的技术工具，并未进行主观干预、修改、编辑等行为，故不应承担过重的平台责任。

2. 以技术有限认为平台仅应承担有限的审查责任

部分观点认为，由于短视频内容简短、传播速度快，如果视频平台逐一比对所有细节，增加了审核难度。如果把审查工作放到事前审查流程当中，审查时间将大大延长，不仅会让优质的用户原创内容失去活力，也会使视频平台上的内容更新速度极大降低，最终导致平台用户数量减少，动摇视频平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台的生存根基。此外，根据《电脑报》对腾讯视频、抖音、快手等 11 个大中短视频平台进行的著作权管理横向测试结果[25]，在审核侵权短视频方面，超过一半的平台未做到事先拦截，各平台目前仍以事后下架为主。同时，各短视频平台经营规模、经济基础、经营方式各有不同，导致各平台对于视频审核的管理水平亦不相同，难以“一刀切”划定平台审核边界。

3. 以算法黑箱认为平台应当承担更多审查责任

算法黑箱是指由于技术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媒体机构、技术公司的排他性商业政策，算法犹如一个未知的“黑箱”，用户并不清楚算法的目标和意图，也无从获悉算法设计者、实际控制者以及机器生成内容的责任归属等信息，更谈不上对其进行评判和监督。[26]基于算法的这一特性，部分观点认为，短视频平台中立的理论已经无法成立，平台对视频内容从“被动呈现”转变为“主动规划”。短视频平台在当代扮演的角色已远远超出中间人的性质，它积极主动介入管理，并依靠流量和广告获取收益[27]，再以技术中立原则豁免平台责任未免不合时宜。

（四）“避风港原则”或“红旗原则”：短视频平台豁免规则的适用困境

1. “通知—删除”规则在短视频平台责任认定中的适用问题

《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 14 条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作出的删除、屏蔽等必要措施是否及时，要根据权利人提交通知的形式、通知的准确程度、采取措施的难易程度等综合判断。[28]但该规则在适用中存在以下两个突出问题：（1）有效的通知应采取何种形式与内容？《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14 条和《民法典》第 1195 条对通知形式和内容作出了详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存在瑕疵的“通知”是否有效？有观点认为，即使形式与内容不完全符合规定，存在一定瑕疵，只要能够达到“对侵权内容的准确定位，就足以证明网络服务者明确知晓哪些内容构成侵权”[29]，有观点则认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通知属于无效通知”[30]。（2）平台采取“删除”措施的效力如何认定？相关规定都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但没有更具体的规范，平台在收到“通知”后需要多久采取必要措施？必要措施应具备怎样的效果和限度？尤需进一步明确。

2. “红旗原则”在短视频平台责任认定中的适用问题

“红旗原则”与“通知—删除”原则相对应的客观行为标准，即侵权行为的事实和情形像鲜亮的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红旗”一样醒目，则应当构成网络服务提供商对侵权行为的“知晓”。《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9条至第13条规定了认定“应知”的相关因素，并在第9条特别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的“具体事实是否明显”来综合考虑。“红旗原则”是以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意识到了侵权情境为主观前提，而并没有对网络服务提供者提出应当意识到侵权的义务要求。通常的侵权纠纷证明责任中，原告需要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上构成“明知”或者“应知”，但往往取证困难。而随着许多短视频平台可以通过技术进行实时监控，以往的主观过错认定标准更为复杂，实务中认定标准和表述存在很多差异。主观标准的不统一与“避风港原则”的普遍适用形成失衡的状态，容易导致主观和客观认定的不一致，不利于实现短视频版权的长远保护。

五、短视频平台著作权责任判断的路径分析

明确短视频平台侵权责任的认定边界，厘清短视频平台责任承担的法律与法理依据，探析技术发展趋势下算法推荐之于平台责任的影响，具化相关概念与标准，由面及点，既有助于减少类案不同判现象，也有助于为解决短视频版权纠纷、规范平台管理、发展大众文化传播提供可预期的法律指引与保障。

（一）短视频平台直接侵权责任的情形区分

对于能够直接认定平台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形，法律适用上没有较大难度，即对于直接侵权的情形采用无过错原则，不管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只要侵权人实施了上述行为，即构成著作权侵权，应承担全部侵权责任。实践中，短视频平台构成直接侵权的情况主要包括以下情形。

其一，平台自主设立自媒体账号发布侵权作品，或平台要求其工作人员在平台注册账号发布侵权作品，以及平台与其他第三方合作发布侵权作品[31]。对此，短视频平台对于侵权行为的实施具有直接控制力，可认定为平台构成直接侵权，应依照无过错原则承担全部侵权责任。

其二，平台虽抗辩被诉侵权内容为用户提供，但无法提供涉嫌侵权用户信息或信息不完整。对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的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能证明该平台侵权行为系其用户实施，应当承担举证不力的法律后果，此时其承担的侵权责任仍为直接侵权责任。而对于平台所披露用户信息，应结合用户注册IP地址、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分布城市、注册时间、用户昵称和头像等因素，综合判断其真实性与合理性。[32]

（二）短视频平台间接侵权责任的情形区分

《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7条第2款、第3款分别规定了平台构成间接侵权的两种行为表现。

其一，教唆侵权，即以言语、推介技术支持、奖励积分等方式诱导、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在此情形下，平台过错不在于对用户侵权的明知或应知，而在于教唆行为以及教唆行为与用户侵权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旦有证据表明平台存在教唆行为，而用户确实实施了侵权行为，则应当认定平台构成教唆侵权，而无需再去考察平台对用户的侵权行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平台只是通过言语、推介技术支持、奖励积分等方式诱导、鼓励用户从事中性行为，则不属于教唆侵权，但可能构成帮助侵权。

其二，帮助侵权，即明知或者应知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未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或者提供技术支持等帮助行为。在此情形下，《民法典》第1197条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7条均规定了平台与用户承担连带责任应满足的两个条件：一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用户侵权；二是未采取必要措施。《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8条第1款亦进一步明确了平台“明知”或者“应知”的具体情形：“明知”指平台知道短视频内容侵权，仍然对其进行传播、推广，抑或放任侵权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大；“应知”则指平台依其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在通常情况下可获知侵权存在的可能。[33]当前司法实践中惯常使用“注意义务”的表述来指代帮助侵权中“应知”的情形。

（三）短视频平台“应知”过错认定的具化标准

司法实践中，平台因“应知”用户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问题，是围绕短视频平台责任界定最具争议性的内容之一。因此，课题组着重细化“应知”过错认定的参考标准，为个案裁判提供初步指引。

1. 平台“应知”用户侵权的判定标准

（1）平台注意义务认定的法定情节。《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10条和第12条规定，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形下，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平台没有承担相应注意义务从而存在过错，承担连带责任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第 10 条），或者采取倾向性较大的侵权构成认定（第 12 条）。

（2）平台注意义务认定的加重情节。《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 11 条规定，对于平台在用户侵权行为中直接获得经济利益的，认定平台应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同时，针对平台与用户签订一系列的版权转让条款或收入分配条款，约定作者上传作品时需将一部分著作权让渡给平台的特定情形，平台应当承担比一般平台更高的注意义务，而不应再局限于“避风港原则”。[34]

（3）平台注意义务认定的酌定情节。将《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 9 条规定情形作为酌定情节参考因素，同时将预防性措施或过滤技术的内容纳入平台注意义务的酌定判断要件，并结合平台规模及技术能力等因素确定在责任判断中的提升权重。

2. 算法推荐对短视频平台“应知”标准的影响

课题组认为，算法推荐不必然提升平台“应知”标准。[35]当前算法推荐对平台侵权内容尚不具备 100% 的识别精准度，其本质上是一个用技术解决如何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拉动长尾内容流量的解决方案。如果赋予平台过重的、与技术发展不匹配的注意义务，不仅不利于创新、对行业发展不利，还可能提高行业成本，甚至形成市场进入壁垒。[36]因此，评价采用推荐算法的平台在某一案件中是否构成侵权，应放到个案中具体审查。具体可结合以下因素予以综合认定。

（1）短视频平台的信息管理能力。可基于案涉平台的成立时间、市场规模、用户数量、著作权管理监测情况及结果等进行初步判断。如“《宫》电视连续剧”案件和“《延禧攻略》电视连续剧”案件中，法院认为，长期从事文娱产业的腾讯公司和字节跳动公司应具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反之，如平台仅为初创、新兴平台，则不应苛责其过高的注意义务。

（2）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的设计目的。可基于算法推荐技术类别进行区分认定。以社会化推荐为例，在影视剪辑类短视频颇为流行的情况下，仍然坚持使用以炮制网络爆款、赚取巨额流量为设计目的的算法推荐技术，可认为其对侵权行为的扩大存在一定程度的放任因素。再如，直接侵权人通过“刷粉”“刷热榜”等行为干扰算法推荐技术的正常运行，在平台对于技术本身已经尽到了足够的管理职责时，则可认为该行为超出了平台注意义务的范畴。

（3）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的运行机制。例如，若平台所使用的算法推荐是基于平行用户的浏览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习惯推荐作品，比如，A 喜欢 1、2、3，B 喜欢 1、2，有可能基于 A 和 B 之间的某些共性，相信 B 也会喜欢 3，所以进行推荐。[37]在这个过程中，除非涉及违法内容，平台并不对 1、2、3 作品内容进行著作权识别，故不应苛责平台承担额外成本去人工浏览、鉴别作品是否侵权。而若在算法推荐过程中，平台在用户上传和浏览过程时，实施了人为干预措施使推荐更精确，则应认为平台有可能会识别出这些侵权或者未被授权的性质，从而应当承担更多的注意义务。

（四）平台“合理必要措施”效果的审查规则

1. 平台原则上不应承担主动审查义务

《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 8 条第 2 款和第 3 款规定，平台附有一般审查和预防义务，且平台不因未主动审查而承担连带责任。[38]可见，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短视频平台原则上不具有与著作权人合作主动监视用户行为查找侵权事实的义务。只要平台能够证明其已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仍难以发现用户侵权，则无须承担侵权责任。[39]

2. “合理、有效”措施应以现有技术水平为基准

关于何为“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存在相对标准和绝对标准两种解释可能。前者的比较对象是特定时期的技术措施实体，即特定技术措施相对于已经存在和运用的技术达到“合理、有效”的程度即可，并不要求特定技术措施能够精确预防特定侵权行为；后者是一种结果视角的标准，即以特定侵权行为没有被发现为由，主张采取的措施不符合“合理、有效”的标准。比较而言，绝对标准显然不具有合理性，否则该条在具体争议中即失去了意义。但相对标准也应当有所限制，构成排除平台责任的所谓“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必须既符合特定阶段的技术发展水平，也达到足够合理、有效的程度。换言之，平台不能以技术尚未达到特定程度为由，一概主张责任豁免。需要指出的是，技术措施只是平台预防或审核用户侵权的一种方式，在特定情形，比如满足《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 10 条、第 12 条法定情节的情况下，短视频平台不能仅仅以采取了“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而否定责任承担。

3. 现阶段不应强制平台承担内容过滤义务

2019 年，欧盟通过《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该指令第 17 条将在线内容分享行为定性为向公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众传播而非中间服务。此类平台需要负积极寻求授权许可的义务，并履行版权过滤义务，即对于权利人

事先提供了相关必要信息或发出充分实质通知的作品，应尽最大努力阻止其出现在平台上并上传。

[40] 欧盟新指令为网络服务提供商设置的内容过滤义务，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引起激烈争论。

[41]

（1）内容过滤是指平台从数据库层面阻断用户再次上传和对外传播侵权内容。但由于短视频平台用户上传内容的特殊性，其内容包含在先视频片段和创作者加入的独创性内容。即便短视频平台具备足够的技术能力对上传内容进行初步对比和分析，仍需通过人工判断是否确实构成侵权。以深圳市某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诉北京某科技有限公司案为例，被告举证说明，根据现有技术条件，无法识别用户上传的视频中是否包含原告主张的游戏画面，无法对相关视频进行实时审核。[42] 课题组问卷调研反馈亦显示，多数平台认为目前的过滤措施还远未达到能够精确识别侵权的程度，且存在出错率高、误伤可能性大等问题。

（2）现行法规定了短视频平台具有公法上的审查义务[43]，即要求网络平台审查过滤涉政、涉黄、涉暴恐等方面的违法内容，但免除了网络平台在私法上的一般性审查义务，即网络平台不需要对版权这种私权的侵权进行审查过滤。其合理性在于，一方面，审查过滤“黄暴反”等违法内容比审查过滤著作权侵权难度要低。因为“黄暴反”等违法内容的审核属于浅度语义审核，基于通用的识别模型即可识别，然而侵权审核属于高阶语义审核，需要进行专门的人工标注和数据训练才可实现。且即使建立了识别模型，模型自身也无法判定哪些内容是被授权发布的或者合理使用的。另一方面，审查“黄暴反”等违法内容代表的是公共利益，比著作权这种私人利益具有更高的保护价值，值得付出更高的成本和代价。[44]

（3）要求特定主体承担审查过滤义务，实质上是让其扮演“守门人”角色，去阻止他人的违法行为。“守门人”是指自身不是违法者，但具有阻止他人违法能力的主体。[45] 根据相关理论，一个特定主体是否承担“守门人”义务，除了其具备阻止他人违法的能力外，更关键的是其是否有能力以合理的成本和代价去阻止他人违法。[46] 因此，不能在没有考虑成本和代价的情况下，仅因为短视频平台具有审查过滤版权的能力（在不计成本和代价的前提下），就让其承担“守门人”职责，为其增加审查过滤义务。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实际上，欧盟新指令制定前后受到欧盟内部各界人士的多方质疑，反对者普遍认为增设内容过滤义务并不能解决“价值差”问题，侵犯了公众的基本权利，也与既有成文法和判例法冲突，还有损于正常的市场竞争。我国学者中肯地指出：“中国可以将《欧盟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第17条所引发的立法争议以及未来转化成国内法后所遇到的司法适用问题，作为法律领域的一项社会实验，不妨以静制动、耐心观察，暂时不在法律中引入强制性过滤机制。”[47]

六、短视频平台著作权生态治理的具体建议

课题组以激励文化传播、激发创新活力、助推数字经济发展为出发点，以司法个案裁量、宏观立法完善及产业实务基础为结合点，就未来短视频平台著作权纠纷解决及短视频行业生态治理提出完善思路，以期在短视频平台发展、权利人保护、社会公众需求之间寻找一个多元利益的最佳平衡点。

（一）短视频平台著作权责任界定的审裁建议

一是关于短视频侵犯他人著作权行为的认定。针对特定短视频对他人在先作品的使用是否构成合理使用的问题，应当依据被控短视频的具体使用情形判断。对于在原创型短视频中直接引用他人音乐作品等情形，应当依法判定侵权。对于二次创作型短视频，应当依据《著作权法》第24条的前置要件和具体列举项目作出判断。特别是，应当区分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和主要引用他人长视频作品并作出详细解说的情形。对于符合合理使用的情形，应当适度允许短视频创作者的介绍、评论；而对于能够构成市场替代、影响长视频权利人的短视频解说行为，则应予制止。

二是关于平台的直接侵权责任。短视频平台承担直接侵权责任的情形包括两类，一类是有证据表明短视频平台员工直接上传侵权作品的情形，另一类是其主张用户侵权但不能提供证据证明的情形。在我国已经普遍实施网络平台实名制的情况下，如原告主张被告已经采取实名制但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侵权用户信息，则应当推定被告承担直接侵权责任，以此督促平台配合权利人的维权行为。

三是关于平台履行“通知—删除”程序的义务及相关责任。对于通知而言，一方面，平台应当提供足够明确、简练的通知途径；另一方面，权利人在维权过程中应当遵循平台依法建立的通知机制，否则权利人要承担通知不适格的后果。对于删除和转通知而言，平台应当依照《民法典》《信息网络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传播权保护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的规定及时作出处理。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机制是否合法合理，应当结合行业一般标准、平台规模和处理能力，以及权利人通知中主张被侵权作品的情况作出判断。

四是关于平台“应知”用户侵权而怠于制止的责任。对于平台侵权行为的体系认定，建议按照《民法典》《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所确立的“帮助侵权”和“教唆侵权”来认定平台的侵权类型。对于因“应知”用户侵权导致帮助侵权成立的情形，应当认识到此时“应知”的认定等同于《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等所确立的注意义务的违反，平台的主观状态为“过失”。因此，“应知”用户侵权而怠于制止的判断、过失的判断、注意义务违反的判断，在此类情形下所考察的内容具有一致性。

（二）短视频平台著作权责任界定的立法建议

一是关于“通知—删除”程序。我国有关“通知—删除”程序的规定分布于不同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其中，对于版权领域的程序而言，《民法典》的规定仍然比较原则，《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和《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的规定存在衔接不够的问题。对于通知的要件及其效力、通知处理的时限问题宜作出细化规范。对此，一方面可以从比较法的角度借鉴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的立法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实际经验，将“通知—删除”程序进一步规范化。例如，抖音积极履行“通知—删除”义务，不断畅通投诉处理渠道，设立了专门的投诉邮箱、端内投诉等，24小时全天候受理投诉和举报，还与一些网站积极探索快速绿色通道模式。建立多次侵权用户处罚机制，对多次侵权的用户，根据侵权严重程度给予不同的处罚措施，如扣分、禁止发言、限制相应权限甚至封号等，并持续发布公报，发挥教育、威慑作用。

二是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教唆侵权的过错。教唆侵权的过错认定，不需要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所列举的一系列“明知”用户侵权的法定、加重或酌定情形。平台如果存在以言语、推介技术支持、奖励积分等方式诱导、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则足以证明其存在教唆侵权的故意。此时不再需要考察“应知”的认定要件，可以直接否定平台依据“通知—删除”程序可享有的责任豁免。《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7条第2款可修改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以言语、推介技术支持、奖励积分等方式诱导、鼓励网络用户实施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成教唆侵权行为，无须审查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网络用户实施的侵害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行为。”

三是关于“应知”的认定。可以借鉴《网络人身权司法解释》第6条第1款第1项的立法模式，明示“以人工或者自动方式”推荐侵权作品均构成“应知”用户侵权判断中的酌定情节，以适应算法推荐时代的平台责任认定需要。但是，考虑到技术发展现状和经济成本，以及过滤技术可能对正常言论的发表和公众正当创作行为的不当限制，不建议在立法层面仓促地明确设定平台采取某种过滤技术的义务，而是建议保持现阶段的做法，即立法明确一定注意义务标准，但将平台的推荐技术或过滤技术作为相应的认定要件。

（三）短视频平台著作权治理的实务建议

一是强化平台社会责任。加强对平台内容的分类管理、对平台用户的监管，同时，有效整合音乐、图片、视频等资源，使长、短视频平台成为连接作品权利人与使用人的纽带，构建先授权、后使用、再付费的著作权授权分发体系，有效减少侵权行为的发生。此外，为避免过滤措施的误伤，建立快速恢复上架和不侵权声明机制，并提供相应的救济渠道。

二是发挥行业协会和相关组织的力量。在政府部门的引导和鼓励下，积极推动中国电影著作权协会等集体管理组织的改革，扩大管理的作品类型，优化协会的集体管理职能，探索网络著作权交易新路径，促进作品的使用和传播，更有力地激发创作者的创作动力，减少著作权争议的发生。

三是推动构建著作权多元许可市场。通过与短视频平台、MCN机构广泛开展合作，以向短视频平台事先集中授权代替短视频创作者事后分散维权；充分利用区块链、智能合约等技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进而增加作品利用效能和权利人收益。

四是针对多发常见的短视频著作权侵权行为进行专项治理。指导用户规范短视频创作行为，引导短视频创作者提高权利意识；法院、行政主管部门、教育机构等单位亦可依托短视频平台，向短视频创作者进行普法教育，普及著作权保护知识。

五是长、短视频平台开启合作共赢新模式。利用各自的特点形成优势互补，如长视频平台授权短视频平台对影视作品进行二次创作，将短视频的流量转化为长视频宣发的优势，吸引更多观众回归长视频平台观看完整的作品，实现对原作品的流量反哺，优化网络视频行业生态，实现平台、创作者和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用户的多方共赢。

七、结语

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迅速发展，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型传播业态发展日渐活跃。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责任的认定，关系到著作权保护和侵权惩戒的适法性与合理性，体现着权利人、网络服务提供者、上传者以及传播者之间的利益衡平与责任分配。在当前的技术背景下，短视频产业的发展对现有的著作权制度并未带来颠覆性影响，“避风港原则”仍是解决短视频著作权问题的一把“钥匙”。以著作权分享为法治治理理念、以时代技术发展逻辑为基础支点、以“优化”和“共建”为关键词，明确网络短视频平台的著作权侵权责任认定标准，妥善分配著作权管理成本，帮助“算法向上向善”，可为解决长、短视频著作权权属之争、数字产业发展之平台自治、大众文化需求之满足提供有效的法律指引与保障，助推形成共融共生、共享共赢的良好数字文化传播秩序。

【注释】

*课题主持人：田绘（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三级高级法官，原广州互联网法院副院长）；课题组成员：邓丹云（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陈贤凯（暨南大学法学院/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高珊珊（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法官助理）、吴博雅（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法官助理）、高泽玮（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法官助理）、刘畅（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法官助理）。

[1]参见《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等发布关于保护影视版权的联合声明》，载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96560654642060784&spider&for=pc>，2024年3月6日访问。

[2]参见《中国短视频行业发展研究报告》，载 <https://www.iresearch.com.cn/Detail/report?id=2643&isfree=0>，2024年3月6日访问。

[3]参见《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载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https://www.cnnic.net.cn/n4/2023/0828/c88-10829.html>，2024年3月6日访问。

[4]温凤鸣、解学芳：《短视频推荐算法的运行逻辑与伦理隐忧——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5]蓝晓燕：《基于智能算法的抖音短视频推荐模式分析》，载《电视技术》2023年第6期。

[6]李琛：《短视频产业著作权问题的制度回应》，载《出版发行研究》2019年第4期。

[7]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与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18）京0491民初1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为“2018年度中国十大传媒法事例”之一。

[8]深圳市脸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与杭州看影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小影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案，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20）浙0192民初8001号民事判决书。该案入选“2021年度中国网络治理十大司法案件”“2021年中国法院50件典型知识产权案例”。

[9]法院认为，短视频模板依托平台制作，具有录影时间短、主题明确、社交互动性强、制作过程简单等特点。在判断短视频模板是否具有独创性时，应坚持利益平衡原则，综合考虑创作与传播、著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宜采取过高的判断标准。短视频模板是否构成作品应主要考虑以下两点：一是短视频模板应由作者独立创作完成，不能复制或剽窃他人作品；二是短视频模板应是作者的创造性智力成果，是作者思想或情感内容的表达，可以体现作者的个性。

[10]北京梦之城文化有限公司诉杭州秀秀科技有限公司侵害类电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案，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19）京0491民初39992号民事判决书。

[11]该案为北京互联网法院2022年发布的涉短视频著作权十件典型案例之一。

[12]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运城市阳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广州优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及不正当竞争系列案，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9）粤73知民初252号民事裁定书。该案为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发布的2020年度版权十大热点案件之一。

[13]二审法院针对部分侵权视频进一步指出，虽然阳光文化公司不是视频上传者，但是阳光文化公司与游戏用户签订《游戏类视频节目合作协议》约定，一方负责制作视频，另一方负责商业运营，双方共享收益。显然，阳光文化公司与上传视频的游戏用户属于以分工合作的方式共同提供涉案视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4条的规定，有证据证明网络服务提供者与他人以分工合作等方式共同提供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构成共同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其承担连带责任。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此时，阳光文化公司构成直接侵权。

[14]作为与短视频平台注意义务的参照，早在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5 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案例“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等与天津市华夏未来文化艺术基金会侵害商标专用权纠纷上诉案”中，法院即认为：百度网讯公司等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其并非对所有链接的网络信息负有审查义务，但其应当采取一些过滤技术防止侵权信息的传播，或对于一些明显的侵权信息及时进行删除。在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罗浮宫公司诉连天红家具公司等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015)闽民终字第 1266 号]中，法院也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可能对所有的网络信息负起审查义务，但其应当采取一些过滤技术防止侵权信息的传播，或对于一些明显的侵权信息及时进行删除。

[15]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诉武汉斗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音乐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参见北京互联网法院（2018）京 0491 民初 935 号民事判决书。该案为最高人民法院 2019 年发布的 10 起中国互联网司法典型案例之一。

[16]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诉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8）京 0108 民初 49421 号民事判决书。

[17]参见《消费者报道》：《短视频版权再起纷争，“X 分钟看电影”将被禁止？83%消费者不同意》，载消费者报道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9377581277438129&wfr=spider&for=pc>，2024 年 3 月 6 日访问。

[18]李琛：《短视频产业著作权问题的制度回应》，载《出版发行研究》2019 年第 4 期。

[19]倪朱亮：《自媒体短视频的著作权法治理路径研究——以公众参与文化为视角》，载《知识产权》2020 年第 6 期。

[20]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与运城市阳光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广州优视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及不正当竞争系列案，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9）粤 73 知民初 252 号民事裁定书。

[21]孙飞、张静：《短视频著作权保护问题研究》，载《电子知识产权》2018 年第 5 期。

[22]王迁：《著作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 年版，第 404 页。

[23]于波：《网络中介服务商知识产权法律义务研究》，法律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9 页。

[24]宋蓓娜、赵娜萍：《新媒体时代下短视频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载《河北法学》2022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年第4期。

[25]测评方法为“40条视频、48小时监测”，即将上述作品原片分别剪辑为1分钟、3分钟、5分钟、10分钟和15分钟共5个版本的短视频片段，并按照视频标题中是否包含片名、演员名等标准，制作成总计40条的不同测试视频，通过用户账号分别上传，观察是否会被平台拦截。如果短视频片段上传成功，再分别在5分钟、30分钟、1小时、6小时、12小时、24小时和48小时后，观察上述侵权视频是否已被平台删除。参见黎坤：《版权意识哪家强？11大中短视频平台横向测试》，载《电脑报》2021年12月6日，第11版。

[26]周翔：《算法可解释性：一个技术概念的规范研究价值》，载《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3期。

[27]曾俊：《论欧盟版权改革对短视频分享平台责任之启示》，载《电子知识产权》2020年第1期。

[28]参见《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14条：人民法院认定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的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是否及时，应当根据权利人提交通知的形式，通知的准确程度，采取措施的难易程度，网络服务的性质，所涉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类型、知名度、数量等因素综合判断。

[29]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民终字第01193号民事判决书。

[30]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07）京73民终1194号民事判决书。

[31]例如，在深圳市脸萌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公司与杭州看影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小影创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案中，被告直接向其用户提供原告享有著作权的短视频模板的行为，即构成直接侵权。

[32]宋蓓娜、赵娜萍：《新媒体时代下短视频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研究》，载《河北法学》2022年第4期。

[33]刘雅婷：《短视频平台版权纠纷间接侵权责任的认定》，载《电子知识产权》2020年第9期。

[34]参见储翔、陈倚天：《影视二次创作短视频版权保护及协同治理》，载《中国出版》2022年第6期。

[35]该部分不讨论短视频平台直接提供侵权内容，或与用户分工合作提供侵权内容的情形（如侵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权用户为与平台签约的 PGC 用户），仅讨论用户上传内容侵权，该侵权内容被算法推荐后，网络服务提供者过错如何认定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在进行下一步探讨前应当首先排除该种可能性。因为算法推荐平台与 PGC 等用户存在分工合作的合同、协议的情况，已经超越了单纯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ISP）的平台身份，其即便是通过算法推荐作品而非人工推荐，也因其依然属于分工合作共同提供作品从而认定其构成直接侵权，此不赘言。

[36]周书环：《“首例算法推荐案”中短视频平台的注意义务认定研究》，载《新闻记者》2023 年第 4 期。

[37]参见张楠、闫涛、张腾：《如何实现“黑箱”下的算法治理？——平台推荐算法监管的测量实验与策略探索》，载《公共行政评论》2024 年第 1 期。

[38]《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 8 条第 2 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对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主动进行审查的，人民法院不应据此认定其具有过错。

[39]《信息网络传播权司法解释》第 8 条第 3 款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已采取合理、有效的技术措施，仍难以发现网络用户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不具有过错。

[40]Directive (EU) 2019/790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7 April 2019 on copyright and related rights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and amending Directives 96/9/EC and 2001/29/EC, Article 17.

[41]代表性文章包括：崔国斌：《论网络服务商版权内容过滤义务》，载《中国法学》2017 年第 2 期；万勇：《著作权法强制性过滤机制的中国选择》，载《法商研究》2021 年第 6 期；等等。

[42]参见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3 民初 2836 号民事判决书。

[43]《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都规定了网络平台的公法审查义务，典型如《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第 8 条规定了网络平台对于内容的管理主体责任，第 9 条规定了网络平台应当建立生态治理机制，其中包括信息发布审核、跟帖评论审核、实时巡查等，第 10 条规定网络平台发现违法内容，应当立即采取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44]参见唐平中：《算法推荐技术原理》，载微信公众号“社科大互联网法学”，2022 年 4 月 28 日。

短视频平台著作权侵权法律问题研究——以长视频平台诉短视频平台纠纷为视角

[45]姚志伟：《平台能够审查过滤“黄暴反”，就要审查过滤版权吗？》，载微信公众号“知产力”，2022年8月25日。

[46]Kraakman R H. Gatekeepers: The anatomy of a third-party enforcement strategy.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 & Organization* ,1986, 2(1): 53-104.

[47]万勇：《著作权法强制性过滤机制的中国选择》，载《法商研究》2021年第6期。

文化传媒 法律资讯

Entertainment Law Update

第五十四期

Contents

July 2024